

文 化 的 商 务

——王云五专题研究

王建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W 150 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 / 王建辉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3057-9

I 文 II 王 III ①王云五 - 人物研究②出版事业 - 中国 - 近代 - 史料 IV .K8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349 号

WÉN HUÀ DE SHANG WU

文化的商务

——王云五专题研究

王建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57-9/G 405

2000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3/4 插页 4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序	章开沅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的新人	(1)
一、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	(1)
二、一个大转型的时代	(15)
三、早期经历中适于从事出版的个人素质	(31)
第二章 出版近代化的探索者	(40)
一、以现代学科分类改组编译所	(40)
二、以科学管理改革商务,成乎败乎?	(48)
三、科学管理法的基本内容	(58)
四、科学管理法的评价	(62)
第三章 国难之下的文化奋斗	(75)
一、“一·二八”炸后苦斗与复兴	(75)
二、“八·一三”上海沦陷前后的决策与复兴	(94)
第四章 新式丛书的出版者	(105)
一、影响近世文化的四大丛书	(105)
二、王云五丛书的出版特点	(127)
三、王云五丛书的时代价值	(139)
第五章 王氏出版的文化符号	(145)
一、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	(145)

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创立	(153)
三、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探索	(159)
第六章 商务两代主政者	(171)
一、王云五和张元济的交谊	(171)
二、王云五与张元济的若干相同点	(180)
三、两代主政的不同面目与分道扬镳	(193)
第七章 与思想文化界的联系	(219)
一、王云五与胡适的精神关联	(219)
二、王云五与蔡元培的两代情谊	(229)
三、王云五与鲁迅不相为谋	(238)
第八章 是是非非王云五	(242)
一、政治倾向的演变	(242)
二、在商务时期的个人经济状况	(251)
三、王云五的出版文化思想	(261)
四、在商务的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266)
五、1946 年以后	(276)
【附录】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年表简编	(284)
王云五新式丛书章程与书目选刊	(287)
主要参考书目	(291)
后记	(295)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的新人

一、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

由于昔日一位学生的推荐——这一偶然的推荐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结下了几乎是终生的不解之缘，也从此登上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大舞台。这个学生是风头出尽的胡适先生，这一年王云五 33 岁，^① 这一年是 1921 年，与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巧合，这一年上距商务印书馆 1897 年在上海创办 24 年。

1. 王云五怎样进入商务印书馆

关于王云五进馆的时间和过程以及推荐人，许多资料略有不同，先予申说。

商务印书馆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 年商务分设三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是它的编辑出版机构。新文化运动兴起，1918 年接替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担任编译所所长的资深编辑家出版家高梦旦（1876—

^① 有的资料说 34 岁。王云五生年，诸书不一，《辞海》为 1888 年；《中国当代名人传》王云五条说王生于 1887 年。

1936)觉得自己观念和知识跟不上形势,而且不谙白话文不说,更不懂外国语言文字(一说他懂得日文而不懂西文),为公司计,决定辞去编译所长职务。蔡元培在日记中说“菊生辞总经理时,董事会要求梦旦继任,梦旦不肯,荐适之自代,适之亦不肯就,荐云五”。^①这里所记有误,张元济不是总经理,也从未曾做过总经理,张任过编译所长,经理,此时为监理。寻找替人这样一个想法,在高心中考虑了很长的时间。这高梦旦也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早期做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和留日学生监督,由张元济引入商务后更是张元济的左右手,被誉为早期商务的“参谋长”,后来也被胡适称为“新时代的圣人”。高梦旦最大的业绩是编教科书——为适应各个不同时期需要而编辑教科书,商务最早的教科书就是由他和蔡元培、张元济三人编辑的。高还参与编写《辞源》、改革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但自1919年起他就开始为编译所物色新的主持人。

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使商务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在这强大的冲击之下,商务印书馆尤其是编译所实际的决策者张元济、高梦旦等,都面临着新思想和旧思潮,新文化和旧文化,新工具(白话文)和旧工具(文言文),新管理方法(资本主义经营)和旧管理方法的激烈冲突。商务印书馆和它的代表者——中国近代出版由旧向新过渡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必须作出新的抉择。说张元济是商务实际的决策者,是因为张元济此时的职务是监理。监理的职责是指导、检查和监督,而实际

^①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第2分册,第32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上仍然是商务的把犁人。^① 这位把犁人将决定着商务未来的走向。眼下，廉颇老矣，正待新人。

最初王云五并不是商务物色的人选，他没有进入商务决策者的视线，商务当局不知道他。一般商务人此前是否知道王云五此人，看来也有一点疑问。胡适 1921 年 9 月 6 日的日记中有如后一句，“我推荐了云五。他们大诧异，因为他们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竟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而王云五晚年自述却说，“高先生与我向无一面之雅，对于我的著译，据后来对我说，虽略曾寓目，以多系从外文译成中文，他既不懂外文，也就无从判别优劣。可是一经适之推荐，便毫不迟疑地着重考虑。”^② 王云五的回忆不避抬高自己，看来还是胡适的记载较为可信。高梦旦把目光盯住了胡适，因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然成为新派的领袖人物。得张元济同意，1921 年春末夏初，高专程去北京请胡适来上海商务。高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是十分诚恳的。”^③ “我们那边缺乏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④ 胡适开始对高梦旦约请他去做编译所长有点不相信，以为不过是高梦旦的客气话，但见高如此说，态度十分认真诚恳，才答应暑假南下来看看谈谈，考察一番。胡适这一番答

① 张元济并不曾担任过商务的最高行政职务。他 1902 年入商务后即担任编译所长，和总经理夏瑞芳（字粹方，1872—1914）合作，1914 年夏遇刺后任经理到 1920 年，张名为经理（相当副总经理）而实际上拥有总经理的权力，1920 年和有名无实的总经理高凤池（字翰卿，1864—1950，商务最早的四位创始人之一）在诸多方面意见齟齬，商务的两位最高职务形同水火，于是张元济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董事遂也劝说高凤池辞职，两人均改任监理，在监理之下设总经理和经理各一人。

② 王云五《袖庐八十自述》，第 77—78 页，商务印书馆（台湾），1967 年。

③ 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 年。

④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 24 页，中华书局，1985 年。

应,应该说对他是有所动的,因为从这一天起,他恢复了中断已经多年的日记,将这件事记述在日记里。这一天是 1921 年 4 月 27 日。

约摸同时,张元济 5 月 15 日也写信给胡适:“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前月梦翁人都,特托代邀惠临指导,俾免陨越。辱蒙俯允暑假期内先行莅馆。闻讯之下,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①从南边向北边发出的信号,表明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所抱有的衷心的诚意与希望。

多次敦促之下,暑假里胡博士果然南来上海。7 月 16 日胡适只身一人到了上海,没有像商务所期盼的那样携带宝眷同行。^②他自然不知道在上海刚发生过一件由他的北大同事秘密领导进行的大事,中国的历史从此就要改观。他也不知道,他的上海之行,也许会给近代中国的出版带来一些重要的变化。

胡适南来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学者的说法也各有不同。有说是捱不过商务的面子践约而来,利用暑假到上海来考察商务编译所,更说他只不过是敷衍商务的面子罢了;^③也有说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点心动,因为商务编译所长的薪水毕竟比一般大学教授高出几倍,论权力也比一个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大得多,他可以网罗海

① 据手迹影印件辨认,见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第 176—177 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 年。

② 商务总馆致胡适打印信函,《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 24 卷收入,唯错与另一函错并为一函,见第 304—306 页,并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 104—105 页,可为佐证。

③ 章锡琛与多数学者的意见,章的《漫谈商务印书馆》,是回忆商务最全面和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内人才,或抛出来袋中物;^①一方面他又何尝不是来沪“虚晃一枪”,借此机会作一次旅游。^②但是最可能的还是,虽然他志意早定,不做此事,不过也不妨“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知识”。^③

在商务印书馆,新文化大师胡适以新文化的“眼睛”来审视这里的一切了。他的日记留下了这一番审视的记录。他参观商务引为自豪的涵芬楼,却在日记里这样评说“西文书甚少,中文书中志书颇多,但远不如京师图书馆。……他们为什么不肯拿这笔钱买些有用的参考书呢?”^④这里透露的信息是,显然那时候商务的“资料室”已不能适应新文化的需要了。胡适又俨然一位考察官,他将编译所的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轮流召见编译所的高等编辑和各杂志的主编,提出问题,了解情况。在《胡适的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很多,除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领导层外,还有杨端六、李石岑、郑振铎、叶圣陶、潘介泉、胡愈之等,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沈雁冰也是被召见的一个。胡适还参加编译会议,与国文部庄俞、英文部邝富灼、词典部方毅、理化部杜亚泉、东文部郑贞文,讨论编中学教科书。商务的少壮派对于商务上层的保守极不满意,胡适对于年轻人的鼓励是很切实的,他对郑振铎说“你们尽管去做”。杨端六,这位当年协助张元济进行中国近代企业最早的会计制度改革的留学生,对于胡适也寄予了希望,他与胡适谈得最为彻底,对于商务弊病谈得最多。胡适也认为“杨君所言,极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陈原出版文集》,第396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③ 《胡适的日记》上册,1921年9月3日,中华书局,1985年。

④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中肯要，”^① 胡适日记中还贴附了杨端六所写的改革意见。在8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征集的意见，也很有一些了”。^② 但胡适如此考察了一个多月后，终于不就，却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③

王云五的机会来了。但胡适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推荐王云五。1921年7月18日的日记记道：“梦旦问我，若我不能来，谁能任此。我一时想不出人来。”大约一个星期后，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王云五，并接着在一个多月中多次提到王云五。

十一时访云五先生(之瑞)，谈了四个多钟头。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只收了政府给他的百分之五的酬奖。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只三十四岁，每日必要读一百页的外国书。(日记，1921年7月23日)

云五先生读书极博，他自己说他的好奇心竟是没有底的，但甚苦没有系统。(日记，1921年7月24日)

云五来谈。我荐他到商务自代，商务昨日已由菊生与仙华去请他，条件都已提出，云五允于中秋前回话。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日记，1921年9月1日)

在不太长的日子里给予一个人空前的好评，这在胡适一生中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50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同上，第180页。

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还是不多见的。说起来也是王云五三生有幸，得了胡适这样的学生。胡适日记第一次提到推荐王云五到商务自代是8月17日。也就是说，胡适抵沪的一个月以后，才想到以王云五自代。事前胡适绝对没有和王云五商量，也未经王云五同意，便把王云五推荐给了商务，作为他自己的替身。胡适推荐的理由，是王云五读书好，办事能力强。胡适在上海逗留约一个半月，给商务推荐了一个王云五（返京后还提交了一份书面改革计划），待王云五和商务老辈见过之后，胡适认为他可以脱身返京了：“我举他代，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日记，1921年9月1日）胡适此行，有两个重要的成果，一是给商务推荐了王云五，在几十年后，他还以向商务推荐了王云五为生平一件了不得的好事。二是给商务增添了改革的气氛，如王云五后来信中向胡适报告的“自从你到过商务后，那编译所改革的空气，就日渐酝酿”。^①而他返京后交出的那篇改革计划，便也成了王云五后来在商务实行最初的改革的一个张本。

胡适对于商务约请他来主持编译所，应该是很重视的，从他恢复停写已逾数年的日记并首先记载高梦旦邀请他来商务任职，可见这件事在胡适心目中的分量。为何胡适一方面觉得，“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日记，1921年4月27日）。“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日记，1921年8月13日），一方面又不愿进商务印书馆呢？说给商务的表面的理由是，“他是一个书呆

^① 《王云五信三十六通》，《胡适遗稿及藏书信》第24卷，第280页，黄山书社，1994年。

子,不善于应付人际关系,王云五则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他强得多”。^①而骨子里却是在日记里写的这一句话:“但我还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贡献能力的人。”(日记1921年4月27日)“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1921年8月13日)。

胡适何以推荐王云五?一则,他需要向商务交差,但并不是敷衍塞责,这从他离沪时没有收受商务给他的1000元劳务费可作说明;二来,他对王云五还是有信心的,从他几天之内的日记对王的好评可以为证。而且胡适还说“他们要我推荐一个相当的人,我竟不能在留学生里寻出一个人来,想来想去我推荐了云五”。^②“想来想去”这四个字很重要,所传导的信息是,对于这个推荐胡适是动了脑筋,作过认真的思考和比较,并不是金蝉脱壳之计;再次,王云五和他有私交,可以信任。茅盾说:“他(胡适)一方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而胡适认为王云五是他可以操纵的。^③以日后的情形证,此说也不无道理。

那么商务何以接受王云五?一些人认为商务之所以接受王云五,是因为碍于胡适的推荐,碍于胡适的面子。甚至于胡愈之这样的智者也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高梦旦先生不知道王是什么样的人,而只是想胡适之是大名鼎鼎,胡的老师大概是不会错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08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的了。”^① 这是不全面的。茅盾的回忆录则说：“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很中意王云五。”^② 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看法既忽略了商务当时确实需要新人，需要引进人才的急迫性，也忽略了商务当局引进人才追赶新潮的胸襟气魄和开明态度，更忽略了商务对王的考察合乎商务本身的要求。依以上论者看来，似乎商务把这样重大的事情等同儿戏，对商务决策者也是一种贬低。王云五无疑被认为是胡适的化身而受到重视，作为一种新文化新知识的代表而来到商务的，更是作为商务的文化火炬传接者而被接受到商务的，应该是商务领导人一种时代性的不含糊的不勉强的选择。十几年以后，胡适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写道：“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自代，这并不奇怪。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是一件大事业求付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后人思念的。”^③ 胡适亲历的感受很真切。

应该指出，当时也有来自商务内部的推荐。推荐人除了胡适以外，还有一个王仙华（商务的资料为王显华，当为胡适误记）。他当时是商务发行所长，是商务的“重臣”。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所记载。1921年8月19日记：“我曾荐云五自代，仙华又荐云五入总务处为机要科长。”9月6日记：“后来王仙华也荐他做商务总务

① 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此文原刊《文史资料》第61辑，在收入该书时胡愈之作了一点说明，说这是二十年前的谈话记录，可能有些观点已不正确了。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处的机要科长,他的推荐与我不约而差不多同时,他们(指商务决策层——引者)更诧异。”王显华在推荐王云五的过程中是起过作用的,归纳起来,这种作用是:1、王显华是商务旧人,来自内部的推荐可以增加信任感;2、在胡适推荐王云五的过程中以及商务对王的考察过程中,王显华多次陪同胡适,宴请过胡适,并陪同张元济正式去约请王云五,胡适日记均有记载(如1921年9月6日)。过去在所有的研究张元济以及研究商务的著作中把这一点给忽略了。

8月23日,王云五第一次踏进商务的门槛,他挟着天时、地利与人和,来到了商务。他是来参观的。他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操纵命运的人。^①他把握住了这一良机。至于他晚年自称“固辞不获”,^②也有人说他并不热衷于任职商务印书馆,^③都不是事实,而三个月后回话不过是一种矜持,“犹抱琵琶半遮面”,学一学他的学生的样子罢了。如他后来说的:“因此我除了提出和胡先生从前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外,也就一口答应下来。”^④而实际上王云五还有一个另外的收获,这就是商务接盘了他的一个小书店公民书局,一部分做了王云五的股金。^⑤但不知这是否王云五提的条件。于是王云五就于9

① 王云五《袖庐八十自述》,第39页,商务印书馆(台湾),1967年。

② 王云五·《七十年与二十七年》,《出版月刊》(台湾),第60期。

③ 徐有守《伟大出版家王云五》,《王云五传记资料》第3册,第15页,天一出版社(台湾),1985年。

④ 王云五·《我所知道的高梦旦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⑤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朱荫伯《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分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498、5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月16日到商务来了,这一天为农历中秋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此要挑中国最大的出版业——商务印书馆的大梁。尽管前路未卜,但历史毕竟垂青于王云五,将一个时代难遇的极好机遇给了他。一个多月以后,高梦旦到了北京,胡适在日记中以少有的喜悦笔调写道:“梦旦因侄病危,亲来看视,今天下午来看我。他说云五好极了,将来一定可以代他。此话使我非常高兴。云五号岫庐,此次真是‘云无心而出岫’了!”^①

2 王云五任编译所长的时间

商务的主体机构设置大致是一处三所,三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一处即总务处(总务处有协调三所的功能,后也称总管理处)。这样一个模式是张元济进入商务后,经过多年的探索,最后在1915年确立下来的,也几乎成为后来中国出版业的通行模式,只是功能有了一定的变化。其中编译所长一职,略相当于如今出版机构的总编辑,旧时人也确有将这个职务诤称为总编辑的,上海的报刊上就曾说胡适的南下是到商务来做总编辑,主管编辑出版业务。^②

王云五确然是胡适推荐来任编译所长的,但王并不是一到商务就担任了编译所所长职务的。这即是王云五坚持先不任所长,而商务在人事安排上也要有一个过程,因为王云五不像胡适有那样大的名气,有那么高的声望。关于王任所长的时间,众说纷纭,如同张元济进入商务的准确时间也产生混淆一样。^③且看比较有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43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同上,第149页。

③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第108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年。

代表性的一些说法：

(1)同时代人的回忆——

胡适曾回忆，王进馆一个月后担任编译所所长。^①

章锡琛回忆，1921年9月，王云五就任编译所长。^②

矛盾的回忆文章，将王云五就任编译所所长职务的时间，记为1922年1月。^③

赵叔诚与赵元任两人在回忆谈话中，说到“1921年王云五进商务”的事：“进去了，还没做编辑所长，还在高梦旦先生的办公室里。”^④ 赵元任那时在上海，胡适和张元济一同去看望过他。^⑤

(2)内地学人与有关机构的记载——

编写于30年代的《本馆四十年大事记》，将王的任编译所长放在1921年条下。

编写于8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在1922年条下标明“王云五任编译所长”，未注月份。

《编辑实用百科辞典》说，高梦旦在辅导王云五半年后，王接任编译所长。也就定为1922年2月了。^⑥

商务印书馆史研究专家汪家熔认为，王在9月任副所长，所长任职时间是1921年12月。^⑦

① 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②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③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④ 《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录》，第174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

⑤ 《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99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⑥ 边春光主编，《编辑实用百科辞典》，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

⑦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第2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第91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3)台湾学者的论述——

徐有守说,王云五于民国十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①

王寿南说是1921年11月正式就任,而他编著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也将王云五任所长职,系于1921年内。^②

黄季陆、阮毅成的文章都说是在民国十年到商务任编译所长。^③

吴相湘云其民国十年九月被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编译所所长。^④

(4)王云五本人的回忆——

王云五1936年的说法是进馆三个月后。^⑤并且多次说到是11月接替所长。在《鲇庐八十自述》中说是1921年底接任所长。^⑥他在多数文章中都是很笼统地说到民国十年他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长之职,^⑦民国十年开始担任该馆编译所所长,^⑧从民国十年起改由其继任,^⑨这大体上都是虚说。

① 徐有守:《伟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王云五传记资料》,第3册,第15页,天一出版社(台湾),1985年。

②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9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1册,第106页,商务印书馆(台湾),1987年。

③ 黄季陆:《为一件历史事实作证》等,《王云五传记资料》第2册,第49—50页,天一出版社(台湾),1985年。

④ 吴相湘:《出版家王云五》,《民国百人传》第4册,并《王云五传记资料》,第5页,天一出版社(台湾),1985年。

⑤ 王云五:《我所知道的高梦旦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⑥ 王云五《鲇庐八十自述》,第79页,商务印书馆(台湾),1967年。

⑦ 王云五《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旧学新探》,第78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⑧ 王云五《七十年与五味》,《旧学新探》,第101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⑨ 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旧学新探》,第167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